

# 亚洲金融危机下的东南亚华人经济

□ 郭 梁

一年多前,当人们还在热烈讨论东南亚经济迅速崛起和“东亚奇迹”内在动力的时候,突然间,1997年7月初,在东南亚“五虎”之一的泰国爆发了严重的货币危机。泰铢贬值立即产生了人们始料未及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金融危机风暴迅速冲击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并进而波及到香港、新加坡、韩国,危及台湾;直至1998年夏季,危机余波犹在扩延,日元贬值风波,俄罗斯金融动荡等等,仍在震撼整个世界。对亚洲的许多国家来说,危机的直接后果是货币急剧贬值,金融机构倒闭,股市和不动产暴跌,外汇储备流失,对外债务负担急增。东南亚国家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失业者激增,经济陷入困境,个别国家如印度尼西亚还发生了国内政坛变动和严重的社会动荡。直到现在,亚洲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许多亚洲国家的上空仍笼罩着愁云惨雾。

东南亚华人经济是东南亚当地民族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当地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当金融危机袭来时,华人经济也不可避免地遭受沉重打击。尤其是华人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金融业、房地产业和进出口业,更是首当其冲,企业倒闭、破产者难以计数,华人经济损失惨重。至于印尼由经济危机引发的政局和社会动

荡,更使华人再次成为替罪羔羊。在这样的形势下,对“东亚经济奇迹”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华人经济将如何生存,能否经受这次“跨世纪前人类面临的重大考验”,受到人们普遍关注。另外,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近80%的外商投资来自此次金融危机波及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来自华人资本,因此了解危机中的华人经济处境和动向十分必要。但是,金融危机蔓延之势并未完全停止,要全面总结此次危机给华人经济造成的影响为时尚早,这里,仅就迄今为止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造成的影响以及华人企业集团的“应变”对策作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今后华人企业集团的发展动向。总之,拟通过分析危机中华人企业集团的处境和动向,来了解金融危机下的东南亚华人经济。

## 一、金融危机的冲击

金融危机给华人企业集团带来的影响,总起来说是使其遭受了巨大损失。然而,由于经营的领域和地区、经营的战略和手法不同,华人企业集团受到影响的程度也不同。

就经营领域来看,以金融、不动产为主要经营领域的企业集团受到的打击尤其沉重。以制造业为主的、面

向国内市场的企业比之面向出口的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

就地区来看,在金融危机危害深重的国家,华人企业集团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大。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华人企业集团所受影响最为深刻,而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有许多华人企业集团的经营陷入了困境。另外,新加坡的华人企业集团所受到的冲击较小一些。但在本国投资的企业集团也都同样受到了经济状况恶化的影响。

就经营手法来看,由于经营战略和手段的不同,负债多的企业集团与债务少的企业集团在危机中遭到的冲击也不一样,那些迅速扩大规模、借入巨额外债尤其是美元外债的企业集团面临的经营困难更大。当然,还有诸如上市与否,与当地官僚权势资本关系密切程度如何,都会直接影响到华人企业集团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程度。

华人企业集团经营的困难,具体表现在:经营业绩的恶化,债务负担的增加,资金周转的困难,大型建设项目的中止和延期,企业停业或者倒闭。

第一、在金融危机中,华人企业集团的经营业绩恶化是不可避免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货币贬值,股市全面下跌,华人企业集团资产损失惨重,营利大减甚至大量亏损。泰国股市的下跌幅度为东南亚各国之最,泰国华人企业所受损失也最大。1997年1月7日至1998年1月7日,泰国股市的狂泻潮中,“亚洲电信”下跌80%，“盘谷银行”下跌65%，“辛纳瓦电脑”下跌64%，“泰国农民银行”下跌60%，可推测泰国华人企业财务帐面上资产价值损失大都在60%以上。泰国石油化学业的最大企业TPI(泰国石油化学工业)在1996年时有8.8亿铢的收益,1997年时有260.9亿铢的收益,而到了1998年第一季度则出现了692.6亿铢的亏损。马来西亚华人企业在这期间的资产价值损失,仅以“成功多多”、“立达环球”、“万能企业”、“名胜世界”、“大众银行”为例,上述几家企业财务账面上资产价值损失平均在50%左右。与1996年相比,1997年度的大众银行集团税前盈利减少21%，太平银行同期的税前盈利减少31.1%，大众金融集团的税前盈利减少24.9%<sup>①</sup>。虽然新加坡受到危机的影响较小,但华人企业所受损失也不容低估,以1997年1月至1998年1月期间的市值来看,“永泰控股”下降72%，金融股“华联银行”下降了68%，“华侨银行”下降58%，“联合工业”下降58%，“城市发展”下降53%，“花莎尼”下降52%，大华银行下降34%，上述企业的帐面资产值平均损失了50%左右。在1997

年,“花莎尼”的营业额比前一年下降了2.1%，税前盈利下降20.8%，净利下降了43.2%<sup>②</sup>。新加坡6家银行(其中4家为华人银行),1997年的纯利润比上一年减少30%，相隔11年后利润减少的情况再现。东南亚最大的华人企业集团印尼三林集团也因印尼盾大幅贬值,使1997年的营利变成“零头”。但经营业绩的恶化只能说是金融危机带来的最轻的影响。

第二、由于本国货币贬值,积累的外债(几乎都是美元外债)负担急增。危机加深后,企业的资金周转陷入困境,申请延期偿还债务的企业不断出现。上述泰国的TPI石油化学企业集团总计有38亿美元的外债。1998年4月,为了偿还债务,决定出售除石油化学和水泥事业以外的属下150家企业。印度尼西亚的轮胎制造企业集团Gadjah Tunggal(大象集团)有14亿美元的长期对外债务、3.5亿美元的短期对外债务,据说其中70%处于呆账状态。三林集团除了面临政治风险以外,负债情况也十分严重。截止1997年底,集团属下的印尼食品公司外债10亿美元,印尼水泥公司外债则有8.3亿美元。由于在印尼目前的局势下新资本难以流入,该集团势必出售资产筹集资金。

第三、由于经营环境的变化、资金周转的困难,正在进行的大型项目被迫延期和中止。马来西亚的伊克兰(Ekran)集团在1995年取得的建筑利权——建设沙捞越巴昆(Bakong)的大型水电站(东南亚最大的水电站),总工程费为15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在金融危机风暴的冲击下,也只得在1997年11月撤退。为了填补撤退的损失,在1998年4月,该集团的董事长陈伯勤(Ting Pek Khiing)出售了本集团的上市企业温利工业(Wembley Industry)的股份,除此而外,也出售了伊克兰公司的部分股票。印度尼西亚的三林集团(Salim Group)也因为资金困难,在1998年4月决定建设中的大型石油化学项目延期进行。在这个项目中,三林集团的资本占40%，英国石油占35%，日本的4家商社占15%，工程的总费用达10亿美元。

第四、金融危机造成的最大影响是企业经营的停止或破产。在泰国,1997年8月金融管理局决定停止56家金融公司的营业,其中多属华人金融公司。到1998年2月至4月,坏帐累累的京华银行(Bangkok Metropolitan Bank)、泰国第一银行(First Bangkok City Bank)、京都银行(Siam City Bsnk)、曼谷商业银行(Bangkok Bank of Commerce)等4家华人银行也因回天无力、求救外资失败而被金融当局接收实行国有化。在印度尼西亚,民营

银行大多数为华人资本经营,最大的民营银行、三林集团属下的中亚银行(Bank Central Asia)也在1998年5月被银行再建厅(IBRA)接管。林绍良家族拥有中亚银行70%股权,苏哈托的家族拥有该行30%的股权,在印尼5月的大骚乱中,该行总行和122家分行都被冲击,150具自动提款机被捣毁,损失达30亿盾(合459,000新元)<sup>⑤</sup>。在印尼政权交替后,因大量存款被提取,该行不得不从中央银行接受了相当于2倍资本金的特别融资。在此之前,多家华人经营的银行已被关闭,其中规模较大的银行,例如陈子兴(Hendra Rahardja)哈拉班集团(Harapan Group)所属的银行及其各地分行250家全部关闭。何筱崑(Samadikun Horfono)现代集团(Modem Group)的金融核心“现代银行”(Modem Bank)由于资不抵债,被政府接受;还有饶耀武(Usman Admadjaja)的“金融银行”(Danamon Bank)、林德祥(Sjamsul Nursalim)的“印尼民族商业银行”(Bank Dagang National Indonesia)、王家发(Kaharuddin Ongko)的“合众银行集团”等也都被关闭。上述银行的华人客户众多,无疑,银行的关闭或被破坏使他们遭受了惨重损失。

第五、金融危机激化印尼国内矛盾,引发暴乱事件,使华人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印尼货币大幅贬值,国内通货膨胀,失业人数激增,人民生活困难,对苏哈托政府的不满被煽动成为排华暴乱,印尼华人再次成为替罪羔羊,这是同样具有排华历史的东南亚其它国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没有发生的现象。

金融危机爆发不久,1997年9月,在苏拉维西省的望加锡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排华骚乱。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政治动荡的加剧,骚乱和排华行动进一步扩大,在西爪哇、中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许多城市,都发生了暴徒抢掠华人商店,焚烧华人店铺和汽车,袭击华人的暴乱。到1998年5月,暴乱进一步升级,不法之徒在雅加达、棉兰等十多个城市对华人商店、住宅、财物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众多无辜华人被打死打伤,华人妇女惨遭强暴,其罪行令国际社会震怒!

关于排华暴乱中华人经济所受损失,目前尚无完全统计资料。仅从1998年5月中旬暴徒在雅加达与西边的文登市与东边的柏加西市、在中爪哇的梭罗市大肆洗劫与焚烧华裔公民的店屋、企业情况来看,是十分惊人的。

在雅加达,草铺(格罗朵)市场有1,457间店铺,城市酒店大厦150个客房,天桥店铺104间,哈戈尔商店8间,奥利安市场100间,格罗朵购物中心700间与店屋

30间,总计3,272间店铺被焚烧。全雅加达被破坏的店铺总计11,290间<sup>⑥</sup>。

据文登(丹格朗市)市长披露,商店被焚者达214间,另有371间店被洗劫与破坏。16座大型超级市场(包括号称东南亚最大的力宝卡瓦拉芝购物中心),洗劫后被烧毁,估计不动产损失达2,250亿盾。柏加西市几乎所有大型购物自动市场都在洗劫后烧毁。567间店屋,9间大商行,24家银行办事处,4间餐馆与2家旅馆亦被焚。汽车、摩托车被毁不计其数。被洗劫与焚毁的商品,据印尼零售商协会主席史提夫·桑达估计约9千亿盾<sup>⑦</sup>。又如在南苏门答腊的首府巨港及中爪哇梭罗,5月中旬也发生了开埠以来最严重的排华骚乱,但印尼当局低调处理,外国传媒报道得也不多。梭罗八成华人住宅、商店遭殃,当地大部分经济设施受到破坏<sup>⑧</sup>。

总之,在排华暴乱中,从华人富豪到小商平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损失难以计数。被洗劫后的华商流离失所,他们毕生的积累化为乌有后将面临严峻的生活问题。排华暴乱的直接结果,也使印尼经济陷入更大困境,几近瘫痪。由于华人商店与印尼国计民生关系密切,大量华人商店被毁,严重破坏了长期形成的商品销售网络和流通渠道,对商品分配造成严重影响,民生必需品价格进一步上涨,印尼盾对美元的汇率也继续下跌,回升无望。暴乱还造成出口业大受影响,自5月中旬以来,来自欧美共值30亿美元的纺织品及鞋子订单被取消<sup>⑨</sup>。至于暴乱所造成的投资环境的恶化,使更多的外商对印尼投资望而却步,或加速撤出资本,因此资金外流将使暴乱产生的经济后遗症更加恶化。

## 二、克服困境的对策

综上所述,在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下,以华人企业集团为代表的华人经济大多损失惨重。然而,华人企业集团也并非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为了克服危机时期的困境,一些华人企业集团在危机爆发不久就采取了对策。对策的主要内容,从大的方面讲,是纷纷采取措施帮助本国经济渡过难关:从企业经营的层面来看,可以举出诸如出售企业和事业,引入外资以增资,整顿核心事业以外的不同事业,从海外撤回企业等等措施。

### 1. 积极参加爱国自救运动

华人经济根植于居住国,是当地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没有当地经济大环境的好转,华人经济从根本上说难以摆脱金融危机造成的困境。所以,当金融危机袭来时,东南亚华人首先与当地

各族人民一道,积极参与各种爱国运动和活动,共渡危难。例如泰国政府发起的“泰助泰”爱国运动,有许多华人团体和华人企业家献金献力,向“泰助泰基金会”捐款,支持泰国政府解救金融危机,以致出现“国家有难,献金献银”的热潮。马来西亚华人也行动起来参加民间自发组织的爱国自救运动。一些华人纷纷从国外调回资金解救马国内困境,出售他们在海外的酒店等。马来西亚华文报纸《南洋商报》在1997年10月22日发表“爱国运动宣言”,呼吁马来西亚各民族团结一致共赴困难,华人积极响应,各团体纷纷召开“爱国行动大会”,华人社团还成立了“马来西亚爱国行动工会”等组织,为恢复马来西亚经济献力献策。印尼的华人企业家也捐献了大量物品开展“济贫运动”,林绍良的三林集团一次捐出10万包价值32万美元的食品,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的华商也纷纷捐款、捐物赈济东爪哇的穷人。华人已在居住国落地生根,他们认同并效忠于入籍国,在危难之际能挺身而出为国分忧是最好的证明。

## 2. 企业经营的调整和应变

许多华人企业集团卖出了属下的部分事业和企业,作为重组事业的一环。出售事业、企业得来的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债务,手中的资金增加了,也有的准备偿还债务后再收买新的企业。

例如,新加坡的旅店置业(Hotel Properties)集团,在这次危机中就卖掉了在英国、澳大利亚的海外资产以充实流动资金。

印度尼西亚的金光集团(Sinar Mas Group)虽然负债40亿美元,然而其产品几乎全供出口,收入也以美元结算,陷入不履行债务的可能性很小。不过,该集团也在较早时候就提出了重组属下事业,出售资产以备偿还债务。例如,属下的造纸企业集伟化工纸业(Tjiwi Kimia)公司的产品有80%供出口,因此在1997年的纯利润增加100%,1998年预计有7成以上的增益。然而,该公司的外币债务达10亿美元,其中80%为美国债务(到2001年偿还2亿美元、2004年偿还6亿美元),剩余的20%是美元结算的国内债务。为了筹集还债的资金,该公司于1998年2月卖掉了他在中爪哇造纸工厂的发电设备,偿还了相当于2亿美元的债务。另外,该公司在新加坡的子公司,上市企业Asia Food & Properties,卖掉了在美国的不动产等资产,所获2.8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还债和充当流动资金。

由于1998年5月雅加达发生的大暴乱和其后苏哈托总统的下台,印尼的三林集团风险不断,苦于应付,但

其对金融危机采取对策较早,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不久就开始“应变”的。1997年11月,三林集团在香港的旗舰企业第一太平(First Pacific)将属下的讯联(Pacific Link)通信公司(位居香港第4位的通信公司)以4亿美元卖给了香港电讯。1998年1月,又将设在荷兰的综合商社马克洋行(Hagemeyer)的38.1%股份以16亿美元卖出。以上两件的卖出所得,偿还了第一太平的全部债务,还有9亿美元现金在重新寻找机会,收买企业。对象乃是菲律宾最大的企业生力啤酒公司,然而却未成功。1998年4月,三林集团的母公司拥有85%股权、第一太平拥有15%股权的美国联合商业银行也以2,000万美元出售了。今后,三林集团将把自身的事业发展集中到亚洲地区,尤其是集中到香港、中国、印尼、泰国和菲律宾。

印尼的力宝集团(Lippo Group),经营比较健全,金融危机后仍有盈利。该集团的全部对外债务为1.5亿美元。尽管该集团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得到政府的特别支持,苏哈托总统家族与其也没有商业关系,但因为同样是华人企业,在1998年5月的暴乱期间,其银行分行、百货商店等也遭到袭击,受到重大损失。金融危机发生后,该企业集团也采取对策改变经营战略,从汽车零件等经营事业撤退,把资源集中到该集团的核心事业银行、不动产、零售业,并决定5年之内停办新的事业。

为了重建陷入经营困难的企业,部分华人企业集团寻求外部支援,发行新股票,使国内外的企业增值。在某些场合,为了避免企业的破产,也出让过半数的股权和经营权。泰国的华人企业集团多采用此方法渡过“生存危机”。1998年后,许多华人企业集团增资成功,筹集了偿还债务的资金,企业的资本金也得到充实。泰国的商业银行有14家,其中华人银行有10家,都无例外地被大量不良债权所困扰,除去被国有化的4家以外,其余6家都是通过内外企业合作来增资,走出了重建经营的第一步。其中,大部分的华人银行在增资后外资的持股份额已超过40%。最大的3家银行依然是由过去所属的华人企业集团或者家族控股。而且,向这些银行加入资本的外国企业,又以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的华人企业占多数。另外被国有化的4家银行预计会被政府金融当局卖给外资,或者重组之后实行民营化。

银行以外的泰国华人企业集团也依靠外资进行增资。从事钢铁生产的伟成发集团(Sahaviriya Group)在1997年出现100亿铢的亏损,外汇债务超过6亿美元。1998年4月,增资100亿铢,外资的出资比例也从过去的31%提高到43%,最终达到49%。另外,伟成发集团

的子公司冷轧钢板企业 TCRSS 也在 1998 年 2 月以增资的形式将资本金从 30 亿铢增加到 43.8 亿铢,合作对象是日本的丸红公司、NKK(日本钢管),他们的出资比例由 11.5% 扩大到 23%,最大的持股者伟成发所占比例则从 50% 减少到 45%。泰国最大的不动产公司玲英豪集团(Land and House)在 1998 年 4 月时资本金已由 50 亿铢减至 36 亿铢,于是,用发行新股票筹集到 49 亿铢资金,使资本金上升到 80 亿铢。C. P. 集团的通讯部门亚洲电讯(Telecom Asia)增资 77 亿铢,外资的出资比例从 48.7% 增加到超过半数,C. P. 集团的出资比例则从 32.3% 减少下去。

重组事业使企业集团的经营集中于核心事业,于是出现了整顿海外的经营,然后撤回到国内事业上来这样的动向。泰国的百货业大王中央集团(Central Groep)关闭了多元化经营的 20 家公司,将资金等重点投入其核心事业零售业、旅店业、快餐业。C. P. 企业集团过去积极开展多元化经营和海外经营,但也有大量负债。C. P. 集团在香港的子公司卜蜂国际(C. P. Pokphang)为了在 1998 年 4 月偿还债务,不得不控制中国以外的事业发展,缩小其事业规模。该集团在泰国国内为了将经营资源集中到本行业,也进行了事业的重组。其最成功的农业综合企业(又称农工企业)经营以核心企业 C. P. Feedmill 为轴心进一步加强了。1998 年 5 月,C. P. 集团将其属下的与农业综合企业有关的 12 家企业统一到 C. P. Feedmill 企业中去。关于零售业方面,在泰国国内拥有 13 家超级市场的洛特斯公司(Lotus)将 75% 的股份以 1.8 亿美元卖给了英国的特士科公司(Tesco),而非 24 小时营业的方便店则继续扩张。在中国的经营方面,1997 年末卖掉了卫星通信事业的股份,而生产摩托车的上海易初摩托的股份已在 1998 年 5 月卖给了合作的中国一方,但在中国上海却在继续发展、扩张购物中心的经营。还有泰国最大的通讯公司秦那越集团(Shinawatra Group)整顿了海外的公司,海外事业也卖掉了。拥有菲律宾合办企业 Islacom 公司 30% 股权的秦那越将此股份卖给了合资对方法国电讯。在印度、老挝经营的通讯事业也在整顿后卖出。走向海外经营步伐比较缓慢的泰华农民银行(Thai Farmers Bank)在海外只有 6 家派驻办事处,金融危机后,关闭了设在印度支那的 3 家办事处,仅维持设在中国的 3 家办事处。

### 三、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

总的说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大多数华人企业集

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但某些受损害较小的华人企业集团也能利用金融危机造成的机会,进行新的投资和企业收买,所以,当我们分析亚洲金融危机中华人经济的状况时,不能仅仅只看到负面影响的一面。

在马来西亚,金融危机发生后,金融当局推进金融机构的合并统一和合理化。大众银行(Public Bank)集团和丰隆(Hing Leong)集团被政府指定为金融公司合并的核心企业。1998 年 4 月,大众银行和丰隆集团各自合并了两家公司。

菲律宾郑周敏(Tan Yu)的亚洲世界集团(Asiaworld International)在 1998 年 1 月 17 日金融危机最为肆虐的时候,新开设了泛亚银行(Pan Asia Banking),注入资本达 16 亿比索,为菲律宾新设银行中市场规模最大者。

菲律宾的杨应琳(Yuchengco)集团把金融危机看作扩大金融业经营的机会。其属下的黎刹商业银行(RCBC)以金融超级市场为目标,在 1998 年 2 月新开设了两家分店。该行除了收买菲律宾山一公司以外,还想收买因母公司经营困难而卖出的东方商业银行,但未成功。1998 年 4 月,该行又收买了首都银行。

马来西亚的金狮(Lion)集团在金融危机冲击下面临债务负担扩大的困境,计划卖掉百货部门的百盛(Parkson)企业以应急,另一方面也继续扩张其他事业。在电子部门方面,金狮集团决定在中国和墨西哥建设新的工厂。在马来西亚国内,该集团的钢铁事业也在继续扩大。总投资达 22 亿林吉特的热延工厂将在 1998 年 11 月投产,总投资额达 25 亿林吉特的线材工厂也预定在 1999 年初投产。这样一来,钢铁部门在该企业集团的销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将从 1997 年的 40% 提高到 2000 年的 55%。另外,该集团也计划在今后 5—7 年内让钢铁生产量增加 1 倍,以进入世界钢铁业界的 15 强之列。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带给华人经济的不仅仅是负面的影响,部分华人企业集团也利用了金融危机带来的机会,扩大自己的事业,可称之为“避凶化吉”吧。

### 四、华人企业的重组与再生

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华人企业集团,今后将往什么方向发展呢?这可以从短期动向和长期的发展趋势两个方面加以讨论。

如果金融危机中华人企业集团的对策能够实现的话,虽然企业经营暂时出现后退现象仍不可避免,但是随着东南亚国家经济的恢复,大多数华人企业面临的困

难也将被逐渐克服。从短期动向看,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华人企业集团,吸取了危机教训并迅速应变,去适应经济危机冲击下的经营环境,在今后的经营行动中将会出现以下变化。

首先,缩小经营规模。部分华人企业集团由于出售企业、增资、导入外资、撤退事业等等原因,经营规模从扩张到缩小,经营战略也从攻势转为守势。另一方面,为了加强核心事业,舍弃了那些与核心事业没有关系的企业和亏本的事业。

第二,整顿海外事业。部分华人企业集团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已经卖掉了海外资产,撤回国内。也有部分华人企业集团反而能利用金融危机的机会,收买了一些企业。但是总起来看,在短时期内,华人企业集团大举向海外发展的现象将会中断。

第三,经营的健全化。具体来说,事业的发展不依赖借款,而是依靠自己的资金。这本来是华人企业的传统,现在又回到传统上来了。

关于长期的发展趋势,今后华人企业集团发展将会有以下变化。

首先,华人企业集团会继续发展,并会继续向新的事业挑战。华人从创设一般企业开始逐渐发展壮大为企业集团,在过去是司空见惯的。现在虽然受到危机打击,但华人的创业精神没有萎缩下去,更多的华人企业家是在危机中经受了考验,总结了经验教训,将会革新传统的经营模式,走向更健康的发展道路。因此,新兴华人企业和集团、新兴财团还会不断涌现。

的确,由于经营环境的变化等原因,也有人认为华人的创业以及企业的迅速发展将会很困难。然而,实际上近年来在亚洲迅速成长起来新兴华人企业集团并不少见,例如丁谓(James Ting)创设的香港家电制造企业“善美环球”(Semi Tech Global)虽然在1982年才创设,但由于在世界各地收买企业在1996年后得到迅速发展,现在,其事业分布在全世界130个国家。该企业在日本也于1991年购买了山水电气,1995年购买了赤井电机。又如名列印度尼西亚企业集团第4位的大金融企业力宝集团,创业才15年。巴里多太平洋(Barito Pacific)集团创业仅13年,已跻身印尼的十大企业集团。

第二,走向现代企业经营道路。华人企业的家族制等传统经营手法对过去的华人企业和华人集团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当然,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华人企业经营方式的弊端也十分明显,例如一些华人银行向同族企业的“乱脉”贷款导致银行几乎倒闭便是例证。随

着企业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尤其随着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和国际化经营的发展,华人企业固有的传统的企业文化逐渐衰落,势必逐渐走向现代企业经营的道路,使华人企业变成为普通的现代企业。正如近年来华人企业经营出现的新动向那样,任用家族以外的人,交班给受过欧美教育的继承者,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等做法已渗透到华人企业中。另外,由于与外国资本合办企业,向先进国家投资等原因,华人企业也必然按照世界上共同的企业规则办事。还有,由于华人企业所在国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企业环境的变化、金融市场完善程度的差异颇大等原因,不可能产生一部通用的“华人商法”。但是,华人企业具有的强韧性这一基本因素,即华人网络的存在和运用应该是不会改变的。可以坚信,这正是华人企业今后能得以发展的重要理由。

第三,华人网络将更加开放。华人网络是华人企业集团发展的巨大优势。然而,华人网络的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如上所述。华人网络已从传统的地缘、血缘、业缘联系变成在更加广阔的地域和范围内,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交流华人企业经济活动的信息情报,以利共同协作。今后,这一网络也将会对外国企业开放。华人企业不仅与当地原住民企业加强合作,在所在国与外国企业、在投资对象国与当地企业共同兴办企业,而且,华人企业与外国企业共同在第三国投资的事业也会不断增加。例如,华人企业对中国的投资中,一般说华人企业之间合作进行投资的项目较多,但华人企业与日本企业、欧美企业合作进行投资的事例也不少。

因此,总起来说,华人企业集团迄今为止已取得迅速发展,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也许会出现暂时的停顿或后退,但是从长远来看,仍会得到新的发展,华人企业集团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可以预料,今后在世界上大企业的排名表中,华人企业集团将会更多地出现。

注释:

①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98年4月10日。

②《世界华商经济年鉴》(1997—1998),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0—33页。

③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5月26日。

④⑤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998年6月5日。

⑥⑦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998年6月7日。

作者郭梁: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